

148期

中華民國一十二年十二月
第一四八期

DECEMBER 2023 NO.148

國內郵資已付
中華郵政北台
字第 7502 號
執照登記為
雜誌交寄

(限向郵局窗口交寄)

雜誌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

目錄

專論

- 1 西安「回流生」抗爭與近期社會情勢觀察
■王韻

研究札記

- 4 兩岸中國的學者和專家是否了解 International Regimes (IR) 而且能夠接受「國際共善的第一階段」這一個最新的翻譯？
■俞劍鴻
- 14 東亞層級關係研究不該變成一種「反事實的思考」
■劉又銘
- 21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訪問北京
■黃郁煊

臺大政治學系 發行 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 贊助

西安「回流生」抗爭與近期社會情勢觀察

王韻 / 政治大學東亞所教授

- 中國大陸「考試移民」現象，凸顯各地教育資源差距及人口流動受國家體制扭曲，形成一條包含從房屋仲介到補教業的產業服務鏈。
- 7月「山河大學」話題及西安「中考」家長維權事件，顯示「考試移民」現象已觸及既得利益階級，都在官方嚴打之下結束。
- 「出生地決定命運」的體制導致「城 vs. 鄉」與「發達 vs. 落後」的結構性矛盾，可能因經濟下行及緊縮意識形態控制而升級。

一、前言

疫情之後中國大陸經濟並未自谷底反彈，投資、消費、出口各項重要指標接連放緩，各行各業面臨縮小規模、減聘、甚至是裁員等挑戰，直接影響大學畢業生的青年就業前景；今年應屆畢業生人數預計將達到史無前例的1,160萬，最保守估計的青年失業率在6月份已上升到歷史新高點的21.3%^①。面對改革開放以來史無前例的就業困境，家長們的焦慮可想而知，今年6月7日上場的「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簡稱高考，類似臺灣過去的大學聯考制度）之後發生的一連串爭議與抗議事件，反應的正是對未來不安全感的焦慮。

二、中國大陸的「考試移民」與「山河大學」現象

與臺灣過去的大學聯招制度類似，中國大陸各大學採行在中央政府統籌之下的聯合招生、「一試定終生」的單一入學考試制度，要能夠進入教育部列冊的「頂尖高校」（被稱為「985」、「211」、「雙一流」等名單中的重點名

校，數量從39到147所不等），而後能找到理想的工作與相應的社會地位，通過「高考」窄門幾乎是唯一的管道，因此這個管道的公平性成為近5億個中國大陸家庭最關心的問題之一，相關討論佔據媒體版面與社群討論區的熱度，甚至不下於每年召開的「全國人民大會」與「政治協商會議」這類重要政治集會，因為從黨國體制上來說，高考也是黨控制社會階級流動與選拔人才最重要的管道。

但與有類似制度的臺灣、日本、南韓不同的是，中國大陸高考沒有全國統一的錄取分數標準，而是考慮各省市不同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給予不同的彈性，試圖讓主要聚集在一、二線大城市的頂尖高校，能有來自全國各地不同社經背景的學生，但這個立意良好的初衷，在中央同時也開始推行「全面放寬落戶限制」的戶籍制度改革之下，產生嚴重的漏洞；各地皆有家長為了讓子女能夠在分數標準比較低的地方報名考試，出現「高考移民」的現象，例如相鄰的河南與陝西兩省錄取分數差可達60多分，同樣一份試卷存在巨大的錄取可能性差異，於是數以萬計的家長們選擇「考試移民」，一是放眼鄰近較為發達但分數線較低的二線城市，另一種策略則是選擇新疆、西藏、青海、遼寧、海南等相對落後但同齡競爭者較少的省份。配合考試移民需求的產業也隨之發展並形成產業服務鏈，像是房屋仲介哄抬偏遠縣城的房價給打算高考移民的家長；或是打著有「教育局關係」旗號的業者，向家長收取高額諮詢費用等等^②；補教業者也看重這個特殊的「教育市場」，提出幫忙媒介辦理搬家、落戶、報名考試的「一條龍」

服務。「決定不了出生地就改變考試地」的國內移民成為熱門現象，也引發一連串的爭議³。

「考試移民」現象反映出教育資源在城鄉及省市之間的強烈差距、以及人口流動長期受到國家體制不公平扭曲的結果，用「腳」突破「高考障礙」成為一般小市民突破社會流動障礙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管道。這個制度造成的扭曲性，在今年 7 月社群媒體中出現的「山河大學」話題中被充分暴露出來。中國大陸高考報名人數 1,291 萬人中「山河四省」（山東、山西、河南、河北籍）的考生就佔超過四分之一、約為 343 萬人，四省中卻僅有兩所「985」（山東大學與中國海洋大學）及三所「211」（河北工業大學、山東大學與中國海洋大學）。四省考生數量偏多與教育資源匱乏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因此網民在 6 月高考話題最熱的時刻，虛構了一所位於四省交界之處的「山河大學」，好事者主張如果 300 多萬考生每人都交 1,000 元人民幣，就有 300 多億（應為 30 億元）打造一所「985」級的綜合性大學（排名第一的北京清華大學 2022 年預算 362 億元），網民甚至自發設計了校徽、校訓、校園地圖、網站、大學課程等活動。這個充滿創意的網路迷因現象很快的受到全國輿論的注意，但其諷刺體制不公的意涵，也迅速引發官方全網封殺⁴。

三、西安「回流生」抗爭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考試移民的矛盾已經下降到「中考」（高中入學考試）階段，例如 7 月以來媒體爆出陝西省會西安市（二線或所謂「新一線」城市）的家長出面陳情與上訪，指控該市 10 萬考生中有高達 4 萬隔壁河南省來的「回流生」（學籍不在西安市就讀但有西安市的戶籍），家長認為這些外來學生墊高了「中考」的分數，排擠本地生的教育資源，控訴三年後本地生將無法考上高中。市政府出面闢謠指出外來考生僅為 3,608 名，只占全市報名人數的 3.5%，但政府的解釋完全無法取信大批憤怒的

家長⁵。7 月 19 日，群眾在西安市的省教育廳門口抗議，集體喊口號「西安娃，要上學！」，當局被迫派出大量公安在現場維穩；22 日凌晨，西安市信訪接待中心門口有家長被帶走，引發現場家長高喊「放人」、「不止三千人！停止錄取！」的抗爭；還有抗議家長在區政府大樓前拉起「我的孩子不是新政和懶政的犧牲品」布條抗議⁶。西安市黨委與政府宣示要成立聯合核查組調查回流生的戶籍、學籍、考試成績，宣稱取締協助「騙取」考試資格的機構，並已控制涉案人員 13 名，抓獲犯罪嫌疑人 16 名，刑事拘留 11 人之後，事件暫時告一段落⁷。

四、結語

中國大陸一、二線大城市中的家長們，為了保護享受一流教育資源子女的未來，自發性地抗議地方政府的「懶政」，這樣的場景其實並不是新聞，過去北京、上海、深圳等超一線城市中都有類似事件發生過，家長保護主義的心情雖然顯然缺乏同理心，但在一樣重視下一代教育的其它華人社會之中，家長們也仍可以感同身受，港臺家庭普遍喜好送子女去考美國留學所需的 SAT、托福 TOEFL、雅思 IELTS 等語言檢定考試，其實也是「考試移民」的另一種翻版。但以中共塑造與維護「出生地決定命運」的扭曲體制，則是中國大陸獨有的「階級」問題，缺乏遷徙與居住自由的社會形成「城 vs. 鄉」與「發達 vs. 落後」兩種結構性的「階級」矛盾，這個老問題顯然在戶籍制度不一致的鬆綁、推行「國進民退」及總體經濟下行的三重壓力之下更為困難，而這些困難也不會隨著政府暫時嚴加監管就會獲得解決。也許既得利益階級的家長們，在政府「嚴打」之後就會滿意地回家，但那些連上街維權都沒有機會、更廣大工農階級中的家長與學生呢？他們又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來反應他們對長期受到歧視的不滿？這些都會是未來這段時間關注中國大陸社會情勢的重點。

注釋

- ❶ 「中國官方疑『粉飾』青年失業率北大教授研究指實際應是 46.5%」，《自由亞洲電臺》，2023 年 7 月 20 日。
- ❷ 「河南陝西大學錄取分差逾 60 分衍生高考移民亂象」，《中央通訊社》，2023 年 7 月 21 日。
- ❸ 「決定不了出生地就改變考試地！西安『回流生』為何『移民』？」，《聯合早報》，2023 年 7 月 27 日。
- ❹ 「中國網民虛構 4 省『山河大學』遭全網封殺！官方急粉飾太平」，《自由時報》，2023 年 7 月 7 日

[2023-08-30]。

- ❺ 「西安市出臺五條措施嚴肅中考政策環境」，《新華網》，2023 年 7 月 22 日 [2023-08-30]。
- ❻ 楊昇儒，「西安家長抗議初中考試不公包圍官署當局承諾徹查」，《中央通訊社》，2023 年 7 月 22 日。[2023-08-30]。
- ❼ 「西安中考『回流生』引爭議『高考移民』低齡化挑戰戶籍改革」，《BBC 中文》，2023 年 7 月 24 日 [2023-08-30]。



徵稿啟事

本通訊歡迎關於中國大陸研究及教學方面的稿件。包括課程設計、教學心得、研究札記、各單位的活動簡訊、新教材或研究資料的引介、正在進行的研究計劃、及時問題討論等與中國大陸教學研究相關的課題。文長以三千字左右為宜，不須註解，並書明投稿人姓名、工作單位、職稱、聯絡地址與電話。來稿請寄 106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或傳真至 02-2365-3433，或將電子檔案傳送至 politics@ntu.edu.tw「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編輯委員會」收。

讀者來信

本欄歡迎讀者來信，就有關大陸研究與教學發表意見、評論，或分享體驗。我們希望通過本欄為這方面的交流開闢一些空間，故不考慮人身攻擊或不帶反省性質的情感發洩。來信請提供真實姓名及通訊地址。編輯保留選稿及剪裁的權利。來信請寄 106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編輯委員會」收。

兩岸中國的學者和專家是否了解 International Regimes (IR) 而且能夠接受 「國際共善的第一階段」這一個最新的翻譯？

俞劍鴻

一個退而不休的特別聘任教授
美國紐約大學博士、前國立中山大學教授暨兼任所長（高雄市）

摘 要

撰寫本文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讓更多的中國人／華人了解何謂 international regimes(ir)。早在 1921 年 4 月，國際社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就出現了一個最早被提到的有關 regime 的條約：Barcelona Convention and Statute on the Regime of Navigable Waterways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當時的中華民國外交官就錯誤的把 regime 翻譯為制度。一百多年過去了，吾人尚未看到標準的中文翻譯／詞彙／語彙。

本文也探討了以下的課題：何謂 ir？作為一個概念的 ir；作為一個國際關係理論的 ir；作為一個國際和全球治理的工具的 ir；最新而且最貼近事實的翻譯是否為國際共善的第一階段／國際初級階段共善／國際（泛）共善的第一階段？；對比其它的翻譯和譯音；為何 ir 是脆弱、容易回到原點的？

總之，筆者認為國際共善的第一階段這一個最新翻譯最貼近西方學術界所理解的 ir。

關鍵詞：國際關係／國際政治、國際 regimes／國際共善的第一階段、機制、譯名標準化、定義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writing this article is to let more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 understand what international regimes (ir) are. As early as April 1921,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had a treaty, for the first time mentioning the term, regime: Barcelona Convention and Statute on the Regime of Navigable Waterways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The diplomat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t that time mistakenly translated the term, regime, as 制度.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have passed, and we have not yet seen a standard Chinese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following topics: What are ir? ir as a concept; ir as a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as a tool in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governance; is the following newest translation closest to the West's understanding of ir — 國際共善的第一階段 (the first stage of international common good) / 國際初級階段共善 / 國際（泛）共善的第一階段; compare and contrast with other translations and transliterations; and why are ir fragile and easy to go back to square one?

In short,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latest, new translation, 國際共善的第一階段 (the first stage of international common good) / 國際初級階段共善 / 國際（泛）共善的第一階段, is the closest to the ir term, as understood by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gimes; mechanism(s); standardize translation; definition

壹、前言

筆者在學術界服務了 35 年。在此學術生涯，international regimes(ir) 是我碰到錯綜複雜 (convoluted)、最難懂的一個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概念。在那個之前，我是對 institution 一知半解，沒有一部中外字典可以解釋地清楚，其中的一個翻譯為 (抽象的) 制度，另外的一個則為 (非抽象 / 具體的) 機構。

從 1999 年的 3 月算起，我思考了 9 年又 11 個月才合乎邏輯地想通了 ir 的 99%：

1. 本質【例如在第四階段的完美結局是 common good (共善或者良善的頂點)¹】；
2. 內涵【例如講究吾人都是站在一邊的 (we are on the same side)；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one for all and all for one²)，(而非倒過來的，亦即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無私；付出；要把運作和執行 ir 的經驗散播到世界各地否則還是自私等等；故，沒有絲毫的權力鬥爭或者爭鬥、打打殺殺的畫面)；
3. 特色【例如各方人馬 (含敵對勢力) 被 shadow of the future (衝過來的未來陰影 / 被認知的客觀、不利環境) 所逼迫而 (學) 會自動自發的和其他人 (含敵對勢力) 合作和協作，以便共同在一個 area【中文翻譯有不少：(特定的) 地方、區域、範圍、(電磁) 空間、範疇和領域 (加上 1970 年初才有和電腦有關的異度 (cyber)】來解決一個和 regime 有關的議題；以及
4. 作用【例如使得國際法、國內法、主權、治權、殘餘主權 (residual sovereignty)、民主、自由、正當性 (legitimacy)、文化、文明等等 100% 地靠邊站、不管用一段時期，哪怕只是半秒鐘】。

在出版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and Regimes* (Routledge, 2012) 和「何謂 International Regimes (IR)：北京是否理解 IR？」【展望與探索月刊 (台北)，(January 15, 2015)】等等之前，如果虛吹我在華人世界是極少數 ir 方面的專家的話，可能早就栽了一個跟斗，因為我不知道如何招架、反駁別人對我所提出的質疑。³

至今 99% 的中國人 / 華人對 ir 一知半解。2022 年 9 月，有一位持有和 Susan Strange 差不多見解而且重視應用 (applied) 的長城學者對我說何必花費那麼多的時間來研究 ir，因為我們還有更多的重要議題要面對、加以解決。更有趣的是，一位官方的學術性刊物的執行編輯對我說由於在台灣地區沒有幾個人懂 ir，就決定不刊登我的有關 ir 的文章了。不過，當這一個官員想通了之後還是採用了我的論文，因為至少在台灣地區我是走在別人的前面、符合搞學術的要件。此外，台灣地區的另外一個官員曾經打電話給我以便了解 ir。當聽完我的講解之後，他說就他的業務範圍只要提機制【mechanism(s)】就足以面對一些人了。殊不知，如果先欠缺一個完整對共善的全部面貌也就是掌握：

¹ 這個概念的啓發來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4813648?mode=whole>, accessed on July 2, 2023.

² In the Daoist sense?

³ 參閱我的「以色列和大陸要的是能夠帶來共善的安全 Regime：後者也要考慮 92 共識 Regime」，《風傳媒》(台北市)，2023 年 11 月 12 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4900265?mode=whole>。

-
1. 被順利帶頭提出構想來（formulated）的第一階段的 ir；
 2. 被運作和執行的第二階段的機制；和
 3. 被再以第三階段的措施【measure(s)】來加以確認、鞏固共善這個結果的話，他就無法合乎邏輯地講解清楚 ir。當然，也要面對立法委員和老百姓的他如果無法在短短的時間讓各方人馬搞清楚 ir，就有可能耽誤了解決問題的時機而遭到指責、被迫下台。另外，一個外交部的法規官員對我說無法建立 ir 這一個新的單位或者把 ir 納入到國際組織司、成為國際組織及 IR 司，因為通過的過程將會冗長，並非想像中那麼的容易。還有另外的一個事實必須要提出來，也就是台灣地區的學術界的確存在一些裝懂 ir 但被逮到的編輯團隊（複數）⁴。有趣的是，我也和一個對 ir 一知半解的院長級的大陸地區教授進行過交流。文章的初稿並非他撰寫的，他卻把他的名字放在第一位。他還覺得沒有必要挑戰美國學者 Steven D. Krasner 的有關 ir 的研究成果。總之，來自各方的阻力倒是蠻多的，再加上由於絕對不可能從小學一年級教起這個非常、非常抽象的 ir，到 21 世紀末精通 ir 的人數可能還是個位數。

貳、與 IR 有關的課題

一、何謂 IR？

Regime 是由法國人先創造的一個單字（word）。Krasner 的定義被不少的中外學者和專家所接納：「在特定的國際關係的 area 上，每一個 ir 都和某一個議題有關係」（each regime has to do with an issue in a given area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我的 2006 年 7 月的第一個翻譯亦即國際（泛）領域暨議題來自這個定義。⁵ 泛的英文為 pan-。

就國內事務，regime（政權）這個字通常帶有負面的含義，例如 2023 年 5 月 12 日，我們聽到吉隆坡的一家華語廣播電台說馬來西亞政府譴責了突然轟炸巴勒斯坦國 / 自治政府的以色列政權。

我們也不要被 ir 的國際這個形容詞給搞糊塗了。由於每一個 regime 牽涉到一個和 ir 有關的議題、area 等等，ir 無處不在，例如你我家中的廁所就是 area 的一個例子；故，可以使用 pan-（泛）這個超越疆界的元素在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society）、（特定的）國際群體 / 共同體【(specific)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國際組織、國際機構等等。

每一個隨時來去或者回到原點的 regime 只是藏在吾人的內心（heart）以及浮現、記掛著或者閃過我們的腦海，絕對、絕對與理想（ideal）、哲學無關。人類是依靠等同於國際共善的第二階段的機制【mechanism(s)】和等同於國際共善的第三階段的措施 / 辦法 / 手段【measure(s)】來加以維持（maintain）、永遠繼續經營（sustain）每一個 regime 的。簡言之，我們要就作為獨立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的國際 regime(s)、機制和措施一起來看，以得到一個完整應對共善這個結果【或者理論架構（theoretical framework）】的全貌：

⁴ 包括被列為「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的期刊 / 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⁵ 或者更加清楚和精確的說「國際（泛）領域暨議題＋至少 15 個核心元素」，要不然就是「被客觀環境所逼迫 / 激發出來，具有規範性合作之國際（泛）領域暨議題」。國際（泛）領域暨議題這個翻譯一度被吾師熊玠接納。

國際 regime(s) +
機制 +
措施 / 辦法 / 手段

須要辨別和確認 (identify) 的 mechanism(s) 可被細分為：(1) 設備、儀器、裝置【device(s)】；(2) 制度和機構【institution(s)】；而制度又可細分為操作或者實踐 (practices) 和組織【organization(s)、body 和 bodies】。措施 / 辦法 / 手段通常是通過開會和實踐得出的。

Ir 並非 100% 的和人道有關。易言之，人道只是間接有關或者沾到邊。這是因為吾人也看得例如與企業有關的 the regime dimension of an international/multinational/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與地球的地理形狀、結構有關的 the (legal) regime of straits, waterways 或者 islands；與一些稀有、可愛動物有關的 the panda protection regime；與 banana 有關的 banana regime，以減少世界各地種植香蕉的農夫之間的收入差距；與外太空有關的先擊落隕石 regime；以及與異度有關的 anti-computer virus regime。

Ir 並不等於機制。和中國大陸的一些學者專家差不多的一個國立中興大學的教授把 ir 翻譯為國際機制。問題不外乎就是：

1. 他並沒有一個完整應對的全貌也就是把 ir 安排在第一階段、機制屬於 ir 的第二階段、措施等同於 ir 的第三階段；和
2. 重複機制會讓初學者更加的混淆：國際機制在第一階段；機制在第二階段、措施在第三階段和共善在第四階段。

二、作為一個概念的 IR

從小到大，我們是從單字學起，例如爸爸。同樣的一個字譬如 regime(s) 拿到學術界就升格為概念了。任何一個概念好比說 ir 都有可能被運用為理論 (theory)。有理論就必須要有模式 (model)，而有模式可以沒有理論，最大的差異就在此。

三、作為一個理論的 IR

Ir 這個理論是在 1970 年代的前後開始被重視的。Oran R. Young 研究北極的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國際治理) 和 regimes。到了 1980 年代初，ir 才被美國的政治學界發揚光大。

四、作為一個工具的 IR

在國際學術界，國際和全球治理是一個主流學派。很多的學者專家無法分辨國際和全球之間的差異。只要有兩個國家在互動就是國際，而全球乃指我們的地球。1970 年初，外國學者和專家開始運用治理 (governance) 來探討環境保護的議題。他們使用的術語為 global governance。一旦談到環境，大陸地區的學者和專家也使用治理這一個概念。1980 年代末，世界銀行的出版品開始大力地推動治理這個概念，而減少使用管理這個概念，以貼近事實。如果人類可以長久居住在月亮或者火星，吾人就要開始使用 intercelestial governance 這片語了。

比較多、和 regimes 有關的議題涉及到國際群體 / 共同體，而全球的議題則比較少。後者的兩個例子為隕石之來襲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而前者的兩個例子為外匯 regime (foreign exchange regime) 和飛行安全 regime (flight safety regime)。

Ir 是國際和全球治理的最佳工具，因為本身的內部 100% 的不會出現權力鬥爭或者爭鬥、打打殺殺的畫面；問題只是每一個 ir 是脆弱的、容易回到原點。讓我簡單地解釋為何其它的幾個治理的主要工具大有問題、非常不可靠。國際法也是一個治理我們無（中央）政府的世界的一個工具。問題出在於每一個條約、公約等等的部分條文最起碼是有利於某一方或者少數的國家。讀者應該馬上聯想或者體會到不公平這個變數。除非把國際（條約）體（制）和系（統）這個大陸地區的翻譯界定為兩個層面，亦即 ir 層面和非 ir 層面，否則這個作為 ir 的翻譯是錯誤的，因為我們的世界至今的確還存在著不平等條約。國際組織也有問題，因為有一些國家無法成為會員國；有時候，就是連成為觀察員或者只出席某一個會議都有困難。國際機構像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也只是照顧一些國家。易言之，有些國家從那些機構得不到好處。傳播媒體也好不到那裡去。這是因為每一家都有它的基本政治立場、被政治正確給左右了。非政府組織會 100% 的公開、公平和公正的處理事務嗎？說不一定，某一個非政府組織是恐怖主義份子的外圍組織或者某一些政治人物用來洗錢的工具。就科學與科技，吾人只要提出一個問題就夠了：研究和發展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難道沒有壞處嗎？⁶ 答案是：很多人將被迫改變行業、遷徙它處尋覓全職工作。當筆者看到以下的文字之時，讀者會和我一樣的不看好人類的未來：包括 Sam H. Altman 在內的數十位專家連署了一份簡短聲明稱，應對 AI 帶來的人類滅絕風險，應是「與應對疫情和核戰同層級的全球優先要務」。⁷ 2023 年 9 月，Altman 在台北市說發展 AI 不會讓人類被取代。的確，2023 年 5 月，美國空軍說 AI 已經發展到以下的地步：可以透過程式自行決定殺死敵對的操作員，以完成任務。⁸

總之，自從有了第二個人類，一個 regime 緊接著一個 regime 就冒出來了，譬如亞當幫助夏娃抵擋野獸，而後者則幫助前者挑水、煮飯，以維持大家（含他們的小孩和其他的人）的生存。切記，當時並沒有文字、規範、法律條文等等，然而人類早就憑著直覺懂得需要或者願意帶頭提出（formulate）各式各樣的 regime。

五、最新而且最貼近事實的翻譯是否為國際共善的第一階段？

至今，兩岸四地加上海外尚未有標準的中文翻譯。⁹ 2006 年 7 月，筆者首次推出以下的翻譯之一：國際（泛）領域暨議題，以貼近以 Krasner 為首的多數外國學者所提到的國際關係、area 和議題。筆者也有譯音（transliteration）的版本，例如國際利積睦。

2008 年 12 月，筆者就 ir（複數）下了一個英文定義：「A set (or sets) of at least 15 criteria/core elements/features (including those four as mentioned by Krasner) in the context of (fragmented) issue-area, (fragmented) issue-areas, and issue-regimes」。中文的翻譯為：「每個 ir 是一套（或多套）以至少 15 個（含 Krasner 所提到的 4 個在內）與【（零碎的）議題 -area】、【（零碎的）議題 -areas】及【議題 -regimes】具有關係的核心元素所形成之組合」。

⁶ David Hanson, Jr. is the robotics designer and founder of Sofia, the first humanoid robot, which was activated on February 14, 2016. He was worried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⁷ <https://www.cna.com.tw/news/ait/202305300428.aspx>, accessed on June 1, 2023. Altman 的公司 OpenAI 研發了 ChatGPT 聊天機器人。

⁸ 參閱《星洲日報》，2023 年 6 月 3 日，第 32 版。

⁹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4427.html>, accessed on May 13, 2023.

2005 年 7 月，我請教了一位在新加坡最高法院工作了幾十年的中英俱佳的李業成。他也無法提供一個標準的中文翻譯。1921 年 4 月，出現了一個最早提到 regime 的條約：Barcelona Convention and Statute on the Regime of Navigable Waterways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1936 年 7 月，一些國家簽署了 Montreux Convention Regarding the Regime of the Straits。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捷克政府工作的 Otto Popper 工程師就多瑙河分別講到 the Danube River system 和 the Danube River regime。¹⁰ 可見，很多的歐洲人懂 ir。就 regime，我國的外交部一向將之翻譯為制度。1982 年 12 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誕生了。Regime 這個概念被提到將近 10 次。出席那個會議的兩位資深、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國大陸教授暨海洋問題專家把 regime 翻譯為制度。國際制度這個翻譯是錯誤的，因為 (1) 制度給我們的感覺是它是固定的；(2) 制度只是整個理論架構亦即國際 regime(s)+ 機制+措施的一小部分；和 (3) 每一個制度有可能是負面的。須要知道到的是，每一個 regime 隨時來去。每一個 regime 是和某一個議題有關而且是針對一個特定的群體 / 共同體，像是一群溫室效應的自然科学學家在某一個地方開大會、散佈在全球各地的泛電腦使用者或者住在某一個小型的特定地區的男女老少居民。在我們的世界，不是所有的議題是和 regime 有關。

吾師熊玠是一位真正的國際關係、國際法、ir 等等專家。他從未使用國際制度這一個翻譯或者由中國大陸學者專家所創造的其它翻譯。他的翻譯有三個：(1) 國際範典；(2) 國際理制；和 (3) 國際理治（模），也就是把治理倒過來。2005 年 7 月 7-8 日，熊在他給我的電子郵件說就第 (2) 和第 (3) 這「兩種翻譯皆有譯音的效果且多少傳達了相同的意義，一般人第一次看到這個翻譯時，他 / 她會猜想這是一個和治理或制訂規章 (regulating) 方面的規範，因為我們將治理兩字倒過來，一般人也可以感覺到它和政府的行政規章 (governmental rule or administration) 不同……」。因此，當 regime 建立在以法律【剛性的 (hard) 國內或國際法】為本體的基礎時，可以稱之為國際理治（模）。」理治即「治理」的顛倒，而「模」是從「模範 (model)」或者規範衍伸出來。我也認為可能對他而言，理治可以被解讀為合理的治理 (rational governance)，因為如果不早日共同解決一個和 regime 有關的議題，那一個特定的國際群體 / 共同體將一起吃虧、到最後通通得不到好處。針對 regime of islands 這個被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使用的片語，熊將其譯為「有關島嶼的規定」。可是，規定是可以被玩弄的，就像美國的海軍利用潮起、潮落的差異抓住時機合法地進入其它國家的領海並且加以散播對它有利的宣傳，譬如說它並沒有違反海洋法。簡言之，規定並不等於共善這個結果。也許我們要把那七個字改變為「有關面對和使用島嶼的共善」。

熊也從未使用國際建制這個翻譯。2023 年 8 月，我在《毛人鳳全傳》的「毛鄭『攤子』」那一章節看到以下的文字：國家安全局的建制是一個辦公廳、四個處以及八個室。問題是：這一種的建制是先為中國國民黨服務的。在台灣地區，估計 60% 的學者專家加上學生和媒體被於 1996 年 10 月出版的《國際建制與國際組織》給錯誤地引導了。如果建制乃指建立（起）制度，其結果為何，我們不得而知。在大陸地區，建制通常是和軍事掛鉤。我也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同文同種的中國大陸學者專家使用國際建制這個翻譯。如同前面所言，制的含義給我的感覺是多少是固定的。在香港，有人把那個地區內的政治劃分為建制和非建制；在此，建制的英文被翻譯為多少是固定的 establishment。如果沒有一個人使用一個被 100% 保持乾淨的廁所，在那裡我們還需要一個保持衛生 regime 嗎？不需要嘛！

¹⁰ In August 1948, it was applied to the navigable part of the river between Ulm and the Black Sea, through the Sukina arm.

也許有讀者認為只要掌握了內涵就不用計較是否有最近貼近事實（表面上的）翻譯。也有部分的學者專家認為既然無法找到精確的中文就維持英文好了：國際 regimes。我倒是覺得最好要推出一個最貼近事實的中文翻譯，而於 2023 年 4 月下旬我和熊老師討論了我的最新翻譯：國際共善的第一階段。之後的不久，我也聯想到國際初級階段共善和國際（泛）共善的第一階段這兩個新的翻譯。同一年的 5 月下旬，我上網一查、看到了和佛教有關的人間共善和全球共善這兩個片語。又之後在 8 月，我看到有關全球共善學思會(TZU CHI Global Symposium for Common Goodness)的第八屆的召開。

就翻譯，大多數人首先想到的是近代翻譯家嚴復的三難原則：信（faithfulness）達（expressiveness）雅（elegance）。

國際共善的第一階段要比其它的翻譯要好，是因為：

1. 每個初學者能夠很快的聯想或者體會到在最後一個亦即第四階段的正面、對大家（含台灣地區對抗大陸地區之際）都好的結果；和
2. 由於提到階段這個概念，初學者就應該知道有第二階段乃至於第三階段。換言之，在第二或者第三階段，負面的現象有可能浮出檯面，使得每一個 regime 有可能要隨時回到原點、需要重新被啟動。

我的最新翻譯的弱點當然是有的：(1) 實在太冗長或者說太多的中國字；和(2) 如果提到不同的 context / 脈絡 / 上下文 / 語境，是否還是只要撰寫國際共善的第一階段這九個字就夠了？須要知道的是，新華社（北京）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的白皮書的翻譯專家會就不同的 contexts 提出不同的翻譯。他們這麼地做也是有問題的，因為如果不檢查、對比原始的中文和外文，所得出的再翻譯的結果是會走樣的。此話的意思是假設原來的作品是中文，一個原始作者或者翻譯者把它翻譯為外文，而另外一位翻譯者把這一個外文作品再度地翻譯為中文。憑直覺，一定會出現走樣的翻譯。

六、對比其它的翻譯和譯音

就 ir，筆者收集到 50 個以上海內外的中文翻譯。國立政治大學的世界貿易組織研究中心的翻譯為「國際規範」。問題是，規範的結果有可能只對某一方有利。中國大陸的翻譯有例如：國際（條約）體（制）（和）系（統）、（國際）法規體系（law regime）、國際機制、國際規制、國際制度、國際軌制、國際體制、國際組織架構、安排、管理方式、統治形式、系統設置、精心安排的生活方式等等。2004 年 10 月 1 日，中國大陸第一次非正式地參加了關於全球經濟事務的七國集團 [Group of Seven (G7)] 會議。其中一個重要的議題為人民幣的匯率。而當讀者在閱讀人民日報的英文版和中文版時將會被混淆以下詞句的意思：(evolution of the Renminbi)「exchange rate **regime**」、「exchange rate **policy**」、「(market-based, managed, floating)」「exchange rate **mechanism**」、「exchange rate **system**」，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英文的粗體字的部分都被翻譯成中文的「機制」。¹¹ 須知，regime 並

¹¹ 高兵強，「完善匯率機制不是簡單調整匯率水準，也沒有時間表」（2004 年 10 月 13 日），2014 年 10 月 14 日下載，
《人民日報》，<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7/2915599.html>. when one U.S. dollar equals to 8.11 Renminbi (RMB). The word system has been translated as tizhi in the contex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But, in the context of floating exchange rate system, it is translated as zhidu. People's Daily Online, "PBOC on reforming

不等於 policy, mechanism 和 system。在 2006 年 4 月一場於白宮的演講當中，中國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到人民幣「機制」，英文翻譯員則將它翻成了「regime」。當時的台灣地區的兩大報則稱之為「制度」。就剛才所提到的翻譯，最大的差別在於沒有一個能夠讓 ir 初學者馬上聯想或者體會到共善這個感覺。又不少的翻譯文字很抽象，要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加以推論與猜測。

七、為何 IR 是脆弱、容易回到原點的？

每一個 regime 是脆弱和容易回到原點的。這是因為我們要靠 Kranser 所講的 principles, norms, rules 和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 (原則、規範、規則和決策程序) 這四個核心元素 (core elements) 來檢驗每一個 regime 是否能夠真正的帶來共善給那一個特定的國際群體 / 共同體。筆者所提出的要求是更加的嚴格：

Entities Criteria/core elements/features	I International regimes (which are not at odds)	II International law	III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V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V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VI Mass media
Positive nature	+					
Principles	+					
Norms	+					
Rules	+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practices	+					
Pan	+					
We are on the same side	+					
One for all, all for one (in the Daoist sense?)	+					
Community-centered arrangements	+					
Cooperation	+					
Coordination	+					
A voidance of mutually damaging outcomes	+					
No power struggle	+					
Transparency	+					
Can mitigate anarchy, tension, (scientific) uncertainly, and mistrust	+					

資料來源：Peter Kien-hong YU,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and Regimes* (London: Routledge, 2012).

筆者認為每一個 regime 要通過另外 11 個新的核心元素的考驗：讀者應該馬上聯想或者體會到說通過 4 個元素和 15 個元素的考驗是不同的——後者當然要比較困難。也因為困難度比較高，每一個 regime 是脆弱的。此話的真正意思是每一個 regime 很容易失敗、要回到原點。這個事實可以從我們所挑選的研究對象更加地看出來：

吾人可以每一個人為研究的對象，例如一顆隕石要襲擊我們的地球，全人類（排除嬰兒、生

the RMB exchange rate regime” (2005 年 7 月 22 日)，2005 年 9 月 22 日下載，《人民網》，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507/22/eng20050722_197772.html。

病的人和植物人)就要懂得比如我為人人、人人為我(而非倒過來,亦即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我們也可以國家為研究單位。全世界有 200+ 個國家和地區。聯合國的會員國有 193 個。當然還有其它的研究對象,像是所挑選的特定國際群體 / 共同體。簡言之,如果以人為單位。環境保護 regime 是很容易失敗的,因為只要有一個害馬之群,把一張紙屑丟在地上。

還有,我們要盡量避免在同一個 area 同時研究兩個以上的 regimes,因為有可能互相抵觸、攻擊。當然也有例外、可以同時探討兩個 regimes,例如我們可以同時探討某一個 regime 和 sanctions regime; 某一個 regime 和 adversary regime; 某一個 regime 和 hegemonic regime;¹² 和某一個 regime 和 Nicholas Tsagourias 所研究的 “necessity and the use of force: a special regime”。

為何使用 force (武力) 也會形成一個 regime? 照道理說,武力之使用會帶來傷害。不過,一旦想通了,邏輯就變得簡單、明瞭,舉例而言:在一節行駛中的地下鐵道列車的車廂,一個乘客突然間亮出了他的小刀子、瘋狂地說他要殺死所有的其他乘客。在那一個封閉的環境,後者肯定會集體地想盡辦法使用武力來反制那一個(也許具有神經病的)乘客。

的確,中國人的文化和西方人的文化是有不同之處。前者很重視情義也講究道德,而後者則淡化它們、認為只能夠平時說說,到了關鍵時刻或者節骨眼根本就是做不到。可是,熊指出國際共善的第一階段這個翻譯 sounds typically Chinese thinking (聽起來乃是典型中國人的思維)。換言之,他並沒有完全否定我的最新翻譯。他也同時指出西方的邏輯思維乃「大者吃小、強者制弱,以此類推。如弱者敢不聽話,則兵刃見之。」¹³ 可見,每一個 regime 非常可能隨時要回到原點、重新出發。

熊的話也讓我覺得要探討一下幾個國際學術界的幾個主流學派,看看每一個是否也逃避不了 it。首先想到的是實力主義 / 現實主義。這個學派的主要觀點是每一人、政黨、國家、國際組織等等所追求的是如何讓他 / 它自己壯大、更加的有權勢 (power)。可是,在一個特定的 regime 之下也許會冒出一個強權 (hegemon) 願意帶頭提出構想來 (formulate),以維持和永續經營某一個 regime。至今,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disarmament regime 仍然存在著。¹⁴ 1970 年 3 月,作為機制的核子武器禁止擴散條約開始生效;截至 2015 年 2 月,一共有 190 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該條約。又不願意先使用核子武器的美國自 2022 年 2 月在 Ukraine 盡量先找一個代理人或者集團來對抗例如擁有核子武器的俄國。

¹² 參考 Robert O. Keohane 的著作,他的和 Joseph S. Nye, Jr. 的 velvet hegemony (柔軟的霸權) 又不太一樣。參閱他的 2009 年 11 月的 The Velvet Hegemon: How soft power can help defeat terrorism。

¹³ 引述來自他的 2023 年 4 月 27 日的電子郵件。他也引述了美國總統 Jimmy E. Carter, Jr. 的話說美國有 242 年的歷史然而只有 16 年沒有打過仗: A derivative would be 以大事小; which was practiced by 周文王 before。Hence, 800 some years of peace during 周朝, the longest dynasty in Chinese history. In our time, 習近平 appears to be enamored by it.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tsunami, China under him loaned out more cash (in US\$) than did the World Bank to the money-strapped nations in Africa. Later, when they could not repay the loans, 習…… was magnanimous enough to forgive the loans. Question: Would an American President do the same? Even if one President would, do you think Congress would let him? Next to your 共善, Western thinking would, most probably, be 共惡。Hence, 大者吃小【、】強者制弱【、】以此類推,如弱者敢不聽話,則兵刃見之。Therefore, wars, wars, wars..., etc. Hence, former President Jimmy Carter lamented that in U.S. history of 242 years, only in 16 years the country did not fight a war!!!!

¹⁴ See <https://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and-disarmament/nuclear-disarmament-arms-control-and-non-proliferation/nuclear-non-proliferation-disarmament-regime>, accessed on May 12, 2023.

(新)自由主義【(neo-) liberalism】這個學派把市場和合約放在第一位。吾人也到處可見 ir，例如 free trade regime (自由貿易 regime)、trade policy regime (貿易政策 regime)、the barrier-reduction trade and commerce regime (減少壁壘的貿易和商業 regime) 或者在冷戰時期見到的 trading with enemies (和敵人進行貿易) 這個行為。由於絕大多數的學者和專家並不擁有公司行號，他們只能夠在資本家和企業家的旁邊敲鑼打鼓，也就是鼓吹好比說每個國家要減少關稅以利國際貿易，亦即讓所有的消費者買到更加便宜的產品。

不要以為(新)馬克思主義【(neo-) Marxism】和 ir 無關。馬克思所講的原始社會就可以說是一個類 regime (a kind of regime)。如果有朝一日人類進入到他們所認知、類似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共產主義社會，那又是另外一個類 regime。

建構主義可以通過 idea (想法) 和 ideal (理想) 來加以了解。Regime 可以被視為一個對一個特定國際群體 / 共同體所引起的共鳴的想法。由於一個和 regime 的議題在某一個 area 必須要早日解決，每一個 regime 是和理想和哲學絕對無關。

第五個主流學派是國際和全球治理。前面已經說過，一旦我們探討這個學派，ir 的研究是逃不掉的，因為 ir 是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人類的最好的一個治理工具。換言之，即便是沒有政府，ir 會是有的，只要在某一 area 有兩個人以上。

當然還有其它的主流學派，例如我的把太極圖加以簡化為一點的一點理論 (one-dot theory)，基於接受或者看到過它的人數眾多。¹⁵ 由於篇幅關係，我只點到為止：我可以輕易的把所有主流學派有關 ir 層面的點點滴滴套進到我的一點理論中的螃蟹和青蛙行動模式。

參、結論

年輕時，我就認識到說絕大多數的東方社會科學研究者被傳統的做學問方式給束縛了，也泰半不敢向他們的老師或者西方的學術界的泰斗挑戰。小時候，我也總以為說有標準的答案。其實不然，例如 1+1 未必等於 2，譬如用一支筆先寫下 1；之後用嘴巴說「加；」再寫下 1，不就等於了一雙筷子、11 (號公共汽車) 等等。

擺脫了束縛之後，筆者發表了像是從 ir 的角度來檢驗教育部的評鑑和建議把台灣地區轉化為專門生產和 ir 有關的產品的一個地方，以利生存。我也和 Krasner 不一樣，後者把 ir 當作一個依賴變數 (dependent variable)，而我則認為，ir 應該是一個有別於中間變數 (intervening variable) 和依賴變數 (dependent variable) 的獨立變數。我也不同意 Beth A. Simmons 與 Lisa L. Martin 的斷言亦即每個 ir largely (都幾乎) 在 1990 年代，被 institution 給取代了。切記，Simmons 和 Martin，有一些 institutions 是和 ir 無關的，也有一些制度是負面的，好比說 (世襲和現代) 奴隸制度。在世界各地，動用一些和 regime 有關的機構是有可能的。當完成使命時，就不須要那一個或者其它幾個特定的機構了。

¹⁵ 2023 年 4 月，首次得知印度的人口首次超過中國。也參閱我的《人類所理解的世界僅僅是一點 / The World as Understood by Human Beings is Just One Dot》，<https://data.newstaiwan.tw/newspage.php?nnid=352467>。

東亞層級關係研究 不該變成一種「反事實的思考」

劉又銘 /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壹、摘要

自 2003 年起，美籍韓裔學者 David C. Kang（康燦雄）開始發表系列有關「東亞國際關係」的研究。透過考察東亞歷史上各國互動的流變，康燦雄認為，相較源自西歐、強調主權國家「權利平等」的西伐利亞國際體系（Westphalia system）；東亞歷史上，自 13 世紀到 19 世紀近 500 年，有一種以中國為核心，強調「國家權利不對等」的層級國際體系（hierarchical system）存在。而且，就算西伐利亞國際體系在 19 世紀隨著西歐國家的船堅砲利進入東亞，國際法體系接著沖擊各國對外行動的觀念與實踐，東亞歷史上既存的層級關係（hierarchy）還是持續影響各國外交政策制定的思維與設計至今。本研究旨在瞭解康燦雄有關東亞層級國際體系的分析，反思康氏理論建構的邏輯推論問題；並且進一步指出，這樣的問題，最終可能導致康文認知的「實證研究」，變成一種「反事實的思考」（counterfactual way）。在理解康氏東亞層級國際體系理論框架的反事實問題後，本文將以康氏研究為基礎，推敲當代東亞國際關係裡，中國應該不是「以古為鑑」而是「以美為鑑」的事實；並且在兼論台灣於康氏研究中為何重要後，反思康氏理論除了反事實思考外的其他問題。

關鍵字：層級關係、無政府狀態、反事實思考、準國家

貳、前言：康燦雄東亞層級國際關係理論簡析

從 2003 年的期刊論文“Hierarchy and Stabilit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ang, 2003a) 與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Kang, 2003b) 開始，康燦雄歷經多本專書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2007),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2010),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nd East Asian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7) & *East Asia in the World: Twelve Events that Shaped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Order* (2020) 寫作，再到 2022 年前後與 Mearsheimer 的對話 (Kang & Mearsheimer, 2022)，以及名為 “Still Getting Asia Wrong: No ‘Contain China’ Coalition Exists” (Kang, 2022) 的期刊論文。

考察康燦雄上述著作後我們可以明白，他的論理始終關切東亞歷史上，以中國為核心的層級關係；以及當代或未來的東亞，是否會重返這種以中國為核心的層級國際秩序。若是東亞重回了以中國為核心的層級至序，那麼美國在這個轉換的過程中，應該如何面對台灣問題，兼且如何調整自身的亞太或印太戰略。康燦雄的理論資源雖自述源於東亞歷史研究，但在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的訓練下，康文有關「層級」（hierarchy）概念的發展，卻來自社會建構論旗手 Alexander Wendt 在真正成為一個社會

建構論者（1999）以前，與 Daniel Friedheim 的期刊論文 “Hierarchy under Anarchy: Informal Empire and the East German State” (1995)。

Wendt & Friedheim 認為（1995），「層級關係」（hierarchy）概念的對照組是「平等關係」（equality），而不是「無政府狀態」（anarchy）。因為無政府狀態下，政治體間的互動，在名義上（nominal）或法理上（de jure），可以是正式的（formal）層級關係或平等關係；同樣的，無政府狀態下，政治體間也可以有實踐上（de facto），非正式的（informal）層級關係或平等關係。這種分類，成功挑戰了 Kenneth Waltz (1979: 103-128) 以降，將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作出「層級秩序」（hierarchy）與「無政府秩序」（anarchy）區隔的過度簡化，讓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更貼近於事實。

而康燦雄有關東亞層級國際關係理論框架的建構，就是以 Wendt 上述的分析為依據。對康燦雄而言，在無政府狀態下，西伐利亞體系強調「正式的、法理的主權國家權利對等」，以及「非正式的國家大小強弱權力不對等下，彼此相互對抗（balancing）」；而東亞層級體系則強調「正式的、法理的國家權利不對等」，以及「非正式的國家大小強弱權力，除核心國家外一律平等」。而構成西伐利亞體系與東亞層級體系最大的差異，除了中國自 15 世紀以來獨大於東亞的物質權力，墊下了自身作為東亞層級秩序核心的基礎外；康燦雄認為，東亞這個層級秩序之所以能夠維持近 500 年的穩定，並且沒有發生大規模全面性的戰爭。原因還是在東亞共同特殊的歷史文化與規範（儒家倫理、天下概念、朝貢關係）。

19 世紀以降，整個東亞以中國為首受到的「西風東漸」，讓西伐利亞體系衝決了故有的東亞層級體系。也讓東亞國際關係的規範，從「國家權利不對等」變成了「主權國家平等」；東亞國際關係也從「正式（法理）的層級關係」與「不正式（事實）的平等」（formal hierarchy

& informal equality），變成了「正式（法理）的平等關係」與「不正式（事實）的層級關係（formal equality & informal hierarchy）」。

但 2000 年前後，中國加入 WTO，在全球自由市場的推波助瀾下，經濟表現亮眼、國力持續攀升。康燦雄就認為（2003a），20 世紀以來美國主導的東亞國際政治，可能會改由中國主導。中國可能代替美國，成為非正式層級關係的核心霸權；中國也有可能成為新核心之虞，改變東亞的國際秩序規則，將西伐利亞體系重新導回古代東亞的層級秩序。也就是以正式的層級關係取代正式的平等關係。

在康燦雄的觀察裡，若是東亞只改變核心、沒改變規則，則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區域霸權，大家一切照舊；若是中國崛起後取代美國，既改變核心、也改變規則，則歷史重演，中國將不只是區域霸權，而是將正式的主權國家平等規則，改為正式的國家權利不對等（層級關係），使自己重回層級體系的核心，再造類似明清帝國的朝貢體系。但無論是前者或後者，東亞周邊各國，可能會「路徑依賴」地依照過往文化所生成的規則行事，容納（accommodating）與管理（managing）中國崛起。

所以對康燦雄來說（Kang & Mearsheimer, 2022），2000 年的東亞或 2020 年的東亞並沒有分別。因為各國基於歷史上長期作為中國核心大國的附庸小國，都不會加入美國遏制中國的聯盟去抗衡中國。

參、康燦雄的反事實思考 （counterfactual way）

康燦雄對於東亞各國並無加入美國遏制中國聯盟的論證，基於東亞各國政治實況、軍事預算與經濟互動的觀察。東亞各國政治實況部分，康氏研究指出（Kang & Mearsheimer, 2022），當代的東亞狀況比 1970 年代的東亞還要更和平穩定。因為 1970 年代的東亞，經歷了越戰、中越戰爭、越南入侵柬埔寨、印尼馬來西亞衝突、

寮國與緬甸內戰、菲律賓、台灣、南韓強人專政，中國也經歷了文革與十年浩劫；相較之下，1990 年後的東亞，除了南海問題的劃界爭議外，並沒有大型的衝突。講得更直白一點，就算「九段線」真的劃到了東南亞各國的家門口；但整個東南亞，除了菲律賓直接投入國際仲裁，以及新加坡政府明言支持菲律賓，強調南海的自由航行外，東協國家甚至沒有任何一國出來口頭聲援菲律賓、支持菲律賓對抗中國的南海論述申索主張（Ciorciari, 2019: 545-550）。基於這個原因，康燦雄就認為，對中國之外的其他東亞國家來說，中國的崛起、乃至中國的行為，都沒有威脅到各國的核心利益或是國家生存。

東亞各國軍事預算部分，按照康燦雄的說法（Kang & Mearsheimer, 2022），東亞各國自 1990 年代至今的國防開支，相較於 1970 年代都是大幅減少；甚至整個東亞區域 1990 年代的國防開支，其實只有 1970 年代的一半。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於 2022 年的資料庫分析也顯示（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22），1990 年東亞各國的整體國防開支占 GDP 約 3%，但到了 2020 年卻只有 1.5%。康燦雄就認為（Kang, 2022），各國國防支出占 GDP 比例，正是對威脅感知（threat perceptions）的硬指標。國防支出占比全面下降，代表各國認為自己沒有立即感受到（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而且各國也相信，只要根據歷史經驗去跟中國打交道，在經貿與外交上採取多邊機制；並且，在中國想要，自己又給得起的地方，給足中國面子、奉中國為區域層級秩序的核心，東亞各國就能維持國家安全，並且持續收穫國家利益。

東亞各國經貿往來部分，康氏以為，歷史上，東亞各國不跟中國這個區域層級秩序的核心撕破臉，是因為相信這樣不會有好果子吃。為了自身安全與外部環境的穩定，在經貿與外交上與中國進行多邊協商、好好交陪，自然就

會有好果子吃。所以無論中國有沒有要改變現有的國際秩序規則，只要在中國國力上升的情況下，各國就會預期中國為區域層級秩序的核心，並且接納中國作為核心的事實；也因為這樣的接納，2000 年到 2020 年這 20 年的時間裡，中國已經成為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國的最大外資與最大海外發展援助國家；而且，相較於美國退出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中國則持續推動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為主的各式區域經貿整合計畫。所以，中國在東亞的區域經濟整合程度遠高於美國；中國對東亞周邊的區域貿易占比也遠超美國，甚至多數東亞國家都有超過 30% 的進出口與中國有關（Kang, 2022）。

基於上述東亞區域政治環境穩定、軍事預算持續下降，以及貿易往來持續提升的數據支持，所以康燦雄從 2000 年到 2020 年，20 年間始終不改其志的認為，因為大部分東亞周邊的中國鄰國，都沒有感受到中國對各國生存構成威脅；所以一個志在圍堵中國的「反中同盟」並不存在（Kang, 2022）。過去歷史中的規範性與經驗，讓各國面對一個強大的中國時，會以「扈從」（bandwagoning）來追求國家利益；而非以「抗衡」（balancing）來追求國家利益。

但問題是，時序進入 2023 年，日韓的軍事預算都是大幅上升的。日本相較去年增加 20%（Kavanagh, 2023）、韓國則增加 5%（Global Data, 2023）。兩國軍事預算占 GDP 比例在未來五年內，勢必也都將超過 2.5%。中國則經濟持續走貶，各國大型高科技製造業因為美中科技戰與貿易戰的影響，開始撤出中國生產線，進行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 Ally-shoring）、近岸生產（Near-shoring）與短鏈革命（Short Supply Chain Revolution），以期獨立於「紅色供應鏈」之外（辜樹仁、張毓思，2023）。在軍事與經濟雙重對立的前提下，東亞各國與中國的多邊主

義互動持續陷入僵局；以美國為首、輔以其他以美國為首，輔以其他東亞國家（與歐洲國家）；以及，以中俄為首，輔以其他中亞國家的「兩大陣營」或「新冷戰」態勢，也因為俄烏戰爭越來越明顯。

甚至更弔詭的是，康燦雄（Kang, 2003b: 70）在他 2003 年的著作“Getting Asia Wrong”中，雖曾提及「歷史先例對於評估層級制度是否在亞洲重現，可能並無太大幫助」；但從 2003 到 2022，康燦雄所有關「東亞國際關係不同於當代以西歐史或大國政治為中心的國際關係理論」推論，卻都是以這種「歷史上曾經出現以中國為中心的層級秩序」，作為亞洲在 21 世紀還會再出現「以中國為中心層級秩序」的依據。因為他相信，東亞各國與中國長期交往的既有歷史經驗，會造成各國對中行為模式的路徑依賴，因此形塑各國「容納」中國，視中國為天然的區域霸權。並且，以中國為霸權核心，自然在東亞形成一個正式或非正式的層級國際秩序。所以康燦雄先是說歷史先例不會影響當下各國的外交實踐，卻又相信各國會受到歷史經驗的影響，選擇包容中國的崛起。這種內在矛盾，若再加上 2022 年至今，各種新的數據都與康燦雄的事實基礎不同的情況下。這讓康燦雄既有的理論架構，越看越像一種「反事實思考」的思想實驗，而不斷的與事實脫軌。

肆、當代中國並非「以古為鑑」 而是「以美為鑑」

前述有關「東亞各國是否感受到中國的威脅」或「東亞各國是否組成遏制中國的聯盟」，基本上都是從周邊國家看中國的視角，來進行分析。但當我們回到當代中國本身時會發現，就算周邊國家以歷史性的眼光看中國，但當下的北京政權是否有以歷史的眼光看待中國的對外關係呢？若是從北京外事體系主導，自上海合作組織、一帶一路，到近期的「三大全球倡議」（發展、安全與文明）來看，中國的對外行動

邏輯還是以維護主權國家體系、強調不干預他國內政為中心（Pak, 2023）。在這個前提下，無論中國是不是修正主義強權（revisionist power）、有沒有目標成為區域霸權（regional hegemony），中國基本上都沒有要改變主權國家原則下的「正式平等」與「非正式不平等」的現狀秩序。既然當代中國不會突然「返祖」，那周邊各國對應的那個講儒家倫理的、強調「正式不平等」與「非正式平等」的古代東亞層級秩序，至少不是現在中國與美國衝突與競爭時，所看重的規則或制定的目標。

所以中國若是要在西伐利亞體系下，遵守主權國家平等的規則與美國競爭，那他的行為模式，或許就會逐漸偏向「單位趨同」（like-units），中國的行為模式會與美國類似，而不是與「歷史上的中國」類似。若是用攻勢現實主義 Mearsheimer (Kang & Mearsheimer, 2022) 的論述來理解時，就是美中雙方競爭者都會因為資源有限，又無法瞭解對方的敵意，所以雙方都會拼命積極遏制彼此，因此形成一個霸權維護與霸權挑戰間的關係。在這個關係中，雙方都會拼命拉攏盟友，也會越來越沒辦法承擔盟友的失去。所以美國在面對中國崛起，或是中國在面對美國的遏制時，都沒辦法透過推卸責任（Buck-passing）讓盟友承擔對手的遏制。所以美國不會迴避對抗德意志帝國、日本帝國、納粹德國和蘇聯；同理，中國也沒辦法在俄烏戰爭中抽手，放任盟友單獨對抗美歐自由世界同盟。

過去美國的中國研究專家，都習慣將當代中國描繪成「脆弱強權」（Shirk, 2007）。也就是，外部世界無論對中國的統治階級或是對普通的中國人來說都是敵意環境，對中國有敵意、對北京有敵意、對共產黨有敵意。所以這個國家的統治，必須依靠「百年國恥」作為政權正當性，以「偉大復興中國夢」作為戰略目標。但這種特殊化中國統治正當性基礎，並將之作為中國對外行為邏輯特殊性解釋的作法，在面對一些解釋美國對外行為的內在源起時，

一樣說得通。

Kyle Lascurettes (2022) 在 *Orders of Exclusion: Great Powers and the Strategic Sources of Foundational Rul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中，提出了「排除秩序」(orders of exclusion) 的概念。他將過去四個世紀的各種國際秩序，從 1648 以後的西伐利亞秩序，到 1815 年的歐洲協調，都解釋成一種「是要讓競爭對手失望」，而不是「讓所有人團結起來」的秩序設計。主導秩序的大國，爲了要確保一個國際秩序的穩定運作，在設計秩序時，都會以「打擊競爭對手或排除具威脅性的潛在對手」爲目標。透過一套規則，懲罰並排除國際社會中的違規者或潛在違規者，以維持秩序穩定。從 1648 年的神聖羅馬帝國與 1815 年的法國，到二戰後美國主導的當代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也透露這種排除秩序的邏輯。也就是，在冷戰時代，排除在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上的敵對國家蘇聯，也同時壓制各地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在後冷戰時代，排除違背國際秩序的行爲者，壓制伊朗北韓核武、顛覆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空襲南斯拉夫；在新冷戰時代，排除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行爲者，支援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維持南海與台灣海峽的自由航行對抗中國。

Lascurettes (2022) 強調，是「對敵人的恐懼，而不是對朋友的信任」，構成了每個時代國際秩序的基石。所謂「外部敵人導致內部團結」的邏輯，通行於各個人文學門。社會學裡的「社會認同理論」強調「內外團體動力學」(the in-group/out-group dynamic)；政治學裡的「負面黨性」(negative partisanship)，都將個人對團體內部的忠誠，建立在團體外部的鄙視。Michael Beckley (2022) 則將這種「排除秩序」，溯源自古羅馬史學家 Gaius Sallustius Crispus (Sallust) 有關「朱古達戰爭」前後的歷史紀錄。因爲 Sallust 認爲，是對強大迦太基的恐懼，使羅馬共和國團結在一起，實踐了共和的政治德性。後世所謂的「薩盧斯特定理」(Sallust's

theorem) 正是將「共和制度或共和國的強大」歸因於「外部強大的敵人」與「時時保持對強大敵人的恐懼和警惕」(metus hostilis)；並因此致力於「制定排除或擊敗強大敵人的國際秩序」。

所以無論「共和」或「共產」，從 Lascurettes 的排除秩序概念來看，國家在想像或組織國際秩序的時候，都會針對主要對手與潛在敵人，設計出一套屬於自己的排除秩序。而制定排除秩序的動機，正是來自對自身脆弱與外部威脅的恐懼。這點無論國家有沒有要成爲修正主義強權，或國家有沒有要改變現有的秩序原則(正式平等或非正式平等)。對外部敵人的恐懼與焦慮，讓所有國家都有這種設計與執行排除秩序的傾向。尤其是在當代主權國家體系下，各國間的正式平等(主權國家權利對等)與非正式不平等(大小國實力不對等)的狀況下，無政府狀態讓各國產生的恐懼是平等的，所以各國彼此設計、彼此排除，對於一個沒有要改變規則的國家來說，也是有限選項下的生存之道。

肆、台灣問題連動各國是否遏制中國

康燦雄 20 年來的研究，都將台灣視爲東亞層級國際關係理論架構的重要指標。他認爲：第一，因爲作爲整個東亞與中國最有可能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的起火點，若連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都是持續增加，軍事預算也沒有提升(Kang, 2022)。上述兩個指標，等若表示台灣並沒有感受到來自中國的生存威脅；所以也等於台灣已經接納自己現狀下作爲一個「準國家」或「類國家」(quasi-states)而持續存在的事實。也就是，享受主權國家大部分的權利，但卻選擇不去爭取主權獨立國家的地位(Kang, 2003a)。但根據當下的局勢發展，我們可以看到從 2022 年開始，台灣國防預算已達 2.5%，與中國貿易往來程度雖仍高，互賴仍深，但直接投資已逐年下滑，台商數量也大幅減少從 200 萬人降低約至 120 萬(BBC 中文網, 2022)。所以在這點上，台灣的態度或許與過去「甘於

類國家地位」或「沒有感受到中國威脅所以沒有提高軍事預算」，已經有所不同。

第二，其實無論過去或現在，美中無論經濟或軍事都還有差距。所以中國無論基於甚麼原因對美國挑釁，基本上都是不明智的。如此一來，為何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 30 多年屢次為台灣與美國槓上？康燦雄就認為（2003a），因為中國人由下而上普遍認定，「中國之所以是中國，那是因為包含了台灣；如果沒有台灣，中國就不是中國」，所以北京必須維持「我不是在統一，就是在統一的路上」這種狀態，才能維持「中國就是擁有『全中國』」的事實。2021 年 11 月，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宏（NG Eng Hen）就強調，「台灣是中國作為一個政治概念之所以能夠存在的正當性的核心（the heart of political legitimacy）」，美國若是想在印太地區維持現有的穩定，就應該遠離這個中共政權政治正當性的心臟地帶（Kang, 2022）。這個說法，算是很精確地描述了台灣作為中國核心利益或是中共生存焦慮的原因。

第三、台灣作為一個「類國家」而存在，其實是東亞周邊國家，以及中國與台灣之間的默契。也就是說，按照康燦雄的認識（2003a），台灣作為類國家而存在，是東亞各國觀測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區域層級國際秩序」是否穩定延續的石蕊試紙。若台灣地位維持類國家，那表示中國尚有足夠的物質權力與文化影響力，來維持自身作為東亞層級國際體系的核心；反之，若台灣脫離了中國認可的類國家地位、打破了東亞各國認知台灣作為類國家的默契，則表示中國作為東亞層級國際體系核心的事實不存在。而這樣的認知，會讓本來習慣於歷史經驗因此形成對中國核心認可的路徑依賴，轉向對中國實力與文化影響力的懷疑，因此集體轉向扞從於美國、對中國進行抗衡。從這個觀點看，各國判斷應該與否或甚麼時候加入美國抗衡中國，其實和台灣的選擇息息相關。但同時台灣的選擇，也端看美中雙邊給出

的承諾，若承諾不足，台灣內部政權也無法維持。當台灣政權不穩定，他所選擇扞從的強國陣營內部也會不穩定（McCormack, 2019: 3-4）。

伍、小結：東亞層級國際體系的再思考

本文從當代東亞國際政治事實的發展，反思康燦雄東亞層級國際關係理論架構的「反事實」問題；並分析中國對外行動的「以美為鑑」，而非「以史為鑑」。所以，重點不是周邊各國怎麼看中國，而是中國不會照各國習慣的古代帝國歷史模式進行對外行動，反而會更像現代國家一般借鑑美國，以成為區域霸權為目標。而在這個過程裡頭，台灣的類國家地位，就成為中國是否持續維持一個以自身為核心層級國際秩序的重要指標。此外，在理論架構上，本文還要指出，康燦雄理論架構的兩個問題：

一方面，事實上，法理上的正式權利不對等，對中國與歐洲而言，皆是古以有之的事情（Ruggie, 1983）。姑且不細究其原由，按照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通說，在這個「西伐利亞神話」中，歐洲「權利不對等」的封建秩序，在時間的遞移中，演變成了「權利對等」的主權國家秩序；而相對之下，按照康燦雄的說法（Kang, 2003a），19 世紀的東亞國際關係，因為「西力東漸」造成了以中國為層級秩序核心的狀態，被西歐的主權國家秩序所取代（國際體系規範上的「正式不平等」也被「正式平等」取代）。對康燦雄而言，當代東亞這個法理上強調「主權權利對等」的主權國家國際秩序，在 21 世紀以後，會因為中國的再起，重回以中國為核心的「權利不對等」層級國際社會。但對本文而言，這樣的說法過度武斷。因為縱使歐洲統合後，德法在布魯賽爾的歐洲議會中擁有較多優勢；但畢竟西歐並沒有因為德法的強大，因此形成一個以巴黎或柏林為中心的層級秩序；也沒有因為美國霸權在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在北約的軍事調度或共同行動上，美國在名義上或法理上就有絕對核心的地位。若要論

證東亞國際關係，會因為中國的重新崛起，因此從強調主權權利平等的主權國家秩序，重新回到權利不對等的層級秩序，或許還需要更多理論證據的支持。

另一方面，二戰後的東亞，在美國領導下的現狀，其實就是一個「正式的平等」與「正式的不平等」共存的狀態。也就是，雖然各國都承認主權國家平等原則，但無論是《美日安保》或《美韓同盟》，美國所負擔軍事上的權利義務，基本上遠多於日韓。而且，日韓軍隊按照條約內容規定，還需受到美方約束；同時，日韓也同意美軍在領土範圍內設立基地駐軍，因此形成一種名義上、形式上或法理上的「不平等條約」。琉球甚至在「沖繩返還」以前，不只是美軍基地的範圍，甚至整個島嶼都是美軍的「類殖民地」；美軍在此地更享有「治外法權」。所以東亞目前以美國為核心的現狀，其實根本不能算是「正式平等與非正式不平等」，反而更像是「正式不平等與非正式平等」。若按康燦雄的理論框架，這甚至更類似古代東亞層級秩序，只是不是以儒家倫理關年來維持，美國與東亞各國也沒有共同的文化淵源。基於這個原因，共同的文化或歷史所構成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層級國際體系，其路徑依賴或歷史慣性未必會強過一個既存的、以美國為核心的東亞層級國際秩序。所以本文認為，東亞層級國際秩序作為一種國際關係理論新框架，未來仍有其他發展的空間。

參考書目

- 辜樹仁、張毓思，2023，〈供應鏈最熱關鍵字〉，天下雜誌，<https://www.cw.com.tw/article/5124783?template=transformers>。
- BBC 中文網綜合報導，2022，〈台灣 2023 年國防預算大增 無人機研發成新亮點〉，BBC 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62685314>。
- Beckley, Michael. 2022. "Enemies of My Enemy: How Fear of China Is Forging a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101(2): 68-85.
- Ciorciari, John D. 2019. "The Variable Effectiveness of Hedging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19(3): 523-555.
- Ferguson, Niall. 2011. *Virtual History: Alternatives and Counterfactuals*. London: Penguin Press.
- Global Data. 2023. "South Korea Defense Market Size and Trends, Budget Allocation, Regulations, Key Acquisitions, Competitive Landscape and Forecast, 2023-2028," in <https://www.globaldata.com/store/report/south-korea-defense-market-analysis/Latest update 20 July>.
- Jackson, Robert H. 1990. *Quasi-States: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scurettes, Kyle M. 2020. *Orders of Exclusion Great Powers and the Strategic Sources of Foundational Rul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vanagh, Jennifer. 2023.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apan's New Defense Budget Is Still Not Enough," in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3/02/08/japan-s-new-defense-budget-is-still-not-enough-pub-88981>. Latest update 20 July.
- Kang, David C. 2003a. "Hierarchy and Stabilit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merican Asian Review*, 21(4): 121-160.
- Kang, David C. 2003b.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4): 57-85.
- Kang, David C. 2007.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ang, David C. 2010.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ang, David C. 2017.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nd East Asian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ng, David C. 2019. "International Order in Historical East Asia: Tribute and Hierarchy Beyond Sinocentrism and Eurocentr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4(1): 65-93.
- Kang, David C. 2022. "Still Getting Asia Wrong: No 'Contain China' Coalition Exist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5(4): 79-98.
- Kang, David C & Haggard, S. 2020. *East Asia in the World: Twelve Events that Shaped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ng, David C & Mearsheimer, M. 2022. 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 "Debate: Should the U.S. Seek to Contain China?" in <https://quincyinst.org/event/debate-is-china-a-threat-to-the-u-s-that-needs-to-be-contained/>. Latest update 19 July.
- McCormack, D. 2019. *Great Powers and International Hierarchy*.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Pak, Yiu. 2023. Nikkei Asia. "China targets sea change in global diplomacy race with West," in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Asia-Insight/China-targets-sea-change-in-global-diplomacy-race-with-West>. Latest update 19 July.
- Ruggie, John. 1983.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Toward a Neorealis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5(2): 261-285.
-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22.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in <https://milex.sipri.org/sipri>. Latest update 19 July.
- Shirk, Susan. L. 2007.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enneth. 1978.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g Grove: Waveland Press.
- Wendt, Alexander & Friedheim, Daniel. 1995. "Hierarchy under Anarchy: Informal Empire and the East German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49(4): 689-721.
-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訪問北京

黃郁煊 /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一、討論議題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Gina Raimondo) 應商務部長王文濤邀請，於今 (2023) 年 8 月 27-30 日訪問中國，雷蒙多是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第四位訪問中國的美國高級官員，雷蒙多的任務是讓美中雙方國民相信，雖然美國存有許多爲了保護美國利益的限制措施，雙方依然可以建立貿易關係，在代表團的陪同下，雙方舉行會談。談論的議題以及內容如下：

(一) 美中科技戰

雷蒙多監管的商務部曾發布許多對於中國先進科技出口的管制措施，引起中方的不滿與報復行爲，有鑑於此，雷蒙多背負著使中共官員認知到美國此作爲的原因與考量因素的使命，雷蒙多表示美方是爲了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雷氏並表示：「這趟訪問主要目的就是對於保護涉及國安策略重要科技做出解釋，並讓事情更加透明化」，並且表示：「(美方) 維護國家安全的立場不會妥協，但與中國交往要保持透明化，才能避免誤會以及不必要的緊張升溫與誤判」^①。

舉例來說，8 月拜登政府宣布禁止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公司在中國投資量子計算和先進半導體的計劃，中方對於拜登此政策十分不滿，當時美國還對可能運往中國的先進半導體和晶片製造設備施加了嚴格限制^②。另一方面，中國官員開始限制可用於製造晶片的金屬出口，破壞了美商英特爾與一家以色列晶片製造商的合併計劃，並禁止了美國晶片製造商美

光 (Micron) 的部分銷售，美光估計這可能導致該公司損失約八分之一的全球收入，專家認爲，此舉措乃爲對拜登政府制裁中國科技業行爲的報復。因此，中國封殺美國記憶體晶片製造公司美光、數據安全及北京的反間諜法都是此行討論內容^③。

(二) 外國企業生意環境惡化

除了上述提及的科技戰，雷蒙多也向西方表達其對於中國管制範圍龐大的反間諜法的擔憂，轉達許多西方企業對其不滿之處，這些企業表示越來越擔心會意外觸犯中國廣泛的國家安全法^{④⑤}。除此之外，中方的技術控制、關稅以及其他貿易壁壘，很可能導致了外國在華投資下降的趨勢。聖地牙哥加大 21 世紀中國研究中心研究教授謝淑麗 (Susan Shirk) 說：「大家對於到中國去感到害怕。」她說，這種對於人身安全的擔心已經影響了商務往來及學術交流^⑥。

(三) 推動其他項目商業往來

雷蒙多等官員認爲，美國與中國之間仍有很大的貿易潛力。中國仍然是美國的第三大出口市場，從美國農場和企業購買超過 1,500 億美元的產品^⑦。疫情之後，旅遊也逐漸再次各國關注的領域，雷氏表示希望促進符合美國利益的雙邊商務關係，觀光旅遊以及人際交流是一大領域。她說，若旅遊恢復到 2019 年水準，中國觀光客將爲美國經濟帶來 300 億元收入^⑧。

(四) 政府溝通

雷蒙多表示，啓程前他或拜登總統指示雙

方要溝通以避免衝突⁹，雷蒙多會見了去年秋天中國共產黨五年一次的全國代表大會之後上任的中國新經濟班子¹⁰的幾位成員¹¹，雷氏表示：「通過溝通來緩解緊張是有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妥協，而是意味著交流。」¹²

(五) 經濟發展趨緩與透明化¹³ / 經濟放緩和透明度¹⁴

經濟學家和觀察人士對中國國家統計局本月決定停止發布「全國青年人等分年齡段」的月度失業信息表示擔憂，該數據最近創下了歷史新高¹⁵，且停止發布青年失業統計等動作也讓外界懷疑中國可能想隱瞞表現欠佳的經濟統計數據¹⁶。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我們相信公開、透明和報告制度」沙利文上週二說。「我們認為，為了全球信心、可預測性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做出合理經濟決策的能力，中國在公布數據時保持一定程度的透明度也很重要。」¹⁷

二、雙方發言要點

以下將分為美方與中方闡述：

(一) 美方

雷蒙多表示：「這些法規¹⁸的執行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沒有妥協的空間，甚至不容討論。但重要的是，對中方要有透明度，我們的國家安全政策能得到中方同行的理解，以避免誤解，避免不必要的升級，避免誤判」¹⁹，週二（30），雷蒙多也告訴中國官員，美國並不尋求切斷與中國的經濟聯繫²⁰（U.S. Does Not Want to Decouple From China），同日，雷蒙多在北京開往上海的高鐵上接受了記者的長時間採訪。她說，企業對知識產權盜竊等長期存在的問題，以及企業遭突擊搜查、新的反間諜法和沒有解釋的高額罰款等一系列新進展表示擔憂²¹。

雷氏表示雙方的談判不涉及國家安全，並且試圖向中方保證，出口管制只適用於美中貿易的一小部分，這些管制是對於雙方以及全世

界皆有利的，並且可以維持雙方非常重要的貿易關係，兩國之間的其他經濟機會應該不受影響²²。

雷蒙多周三（31）在與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會談開始時表示，她提出希望討論的為：「合作取得商業目標、促成一個更可預知的營商環境、一個可預知的政策管理環境和一個為美國商家參與的公平競爭環境的途徑」，陳吉寧則表示：「美中之間穩定的關係對於全世界都很關鍵」。他還說：「上海擁有全中國最多的美國公司」。而在離開上海前的記者會中，雷蒙多表示他不預期此行能夠帶來美國公司在中國營商的問題上的重大突破，但也希望未來數月內能看到此行帶來的成果²³。

(二) 中方

雷蒙多與葉倫相同，都是被認為對中國相對友好²⁴的高層官員，中方給予的態度是較為友善的。中國商務部以不具名發言人名義對此表示：「這是中美雙方前一階段共同努力的結果，這有利於中美兩國企業開展正常貿易，符合雙方共同利益，表明只要本着坦誠合作、互利共贏的原則，完全可以找到對雙方企業都有益的解決辦法²⁵。」

雷蒙多此行也訪問中國總理李強，李氏告訴雷蒙多：「中美之間的經濟關係是『互利共贏』的。但他也警告，「把經貿問題泛政治化、泛安全化，不僅嚴重影響兩國關係與互信，也損害兩國企業和人民的利益，將給全球經濟帶來災難性影響。」除此之外，雷蒙多會見副總理何立峰時，中方也表達了對美方 301 關稅、對華出口管制、雙向投資限制等措施的關切，但是中美雙方同意，應繼續保持溝通，支持兩國企業開展務實合作²⁶。

三、主要成果以及這次會談對雙邊經貿互動

雷蒙多在週一（29）與中國商務部長王文

濤會面，且同意定期展開對話，談論商業問題開展定期對話，並且預期納入各界商界領袖和政府官員，兩國政府還同意就美國如何實施出口管制交換資訊²⁷。其中，雙方也就中美經貿關係和共同關心的經貿問題進行理性、坦誠、建設性的溝通，並宣布成立工作小組²⁸。

雷蒙多會見了中國文旅部長龔和平，兩位部長會上達成一致，兩國將於明年初在中國舉辦一次旅遊發展促進會議，這是雷蒙多籌辦的一系列商業推廣活動中的最新一項²⁹。

四、對全球及台灣之影響

如前所述，雷蒙多表示美方將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是為國家安全，在出口管制問題上，美方不會做出讓步，本文認為這也表示科技產業的保護與發展乃美國的核心利益，要大幅度影響出口設限著實有其困難之處，惟雷蒙多也強調此次訪問中國的最大成就，乃是與中方建立了「定期溝通的機制」，是向前邁出的一大步，雙方增加分享訊息和透明度的機會³⁰。

有鑑於此，本文認同雙方仍有合作的機會，雖然短期內彼此在高科技上的矛盾難以完全化解，但是兩國之間還是有些許可茲合作的領域，例如前述所提的旅遊上的合作，這興許也是緩和中美竟和局勢的途徑之一，如同中國全球化智庫高級研究員何偉文所述，雷蒙多訪中的焦點大多集中在美國限制高科技出口的問題上，需觀察在這方面是否會有建設性的對話，因為它可以為雙方處理其他經貿問題奠定基礎³¹。

此次雷蒙多的訪問，本文未看到關於台灣議題的討論，而是主要著重於中美雙方經貿議題的商討，對台灣的影響目前仍未能完全篤定，但本文認為可能也會反映在台美之間非高科技的合作變化上，值得繼續觀察。除此之外，美國近來訪中的高層官員中，並非每個都像雷蒙多、葉倫的鴿派人士，也派被視為較有鷹派色彩的布林肯訪中，本文認為美方也有意以此

緩和中方對於台灣的敵意，有類似胡蘿蔔與棒子的美國外交作風。

五、未來雙方推動領袖對話、氣候等領域合作前景

雷蒙多在訪問中國時，與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中國文旅部長龔和平，達成未來更多接觸機會的共識，與王文濤達成未來會持續展開對話的共識，與龔和平達到明年初於中國舉辦旅遊發展促進會議的成果，本為認為由此可見，未來雙方的領袖對話與一些領域，如旅遊業的合作可望提高，而這些成果興許也有機會外溢到其他議題，例如氣候合作等。

六、美國對中國大陸經貿、科技政策可能走向

最後，如同雷蒙多一再地強調的，科技政策將攸關美國的國家安全，將是篤定的政策，但這也是造成中方不滿之處，也是雙方關係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如前所述，美方企業也對於中方的眾多限制政策，例如反間諜法、對外關係法等不滿，並且降低前往中國投資的意願，這也是雙方僵持不下的議題之一。因此，本文認為至少在短期內，雙方在中國大陸經貿、美方的科技政策上可能較不易產生轉變，就像雷是在離開上海之前的記者會上所表示，此行並不意味著雙方將有立即的轉變，而是希望慢慢地看見談判成效；雖然如此，美國商務部長終於訪問中國，雙方面對面討論議題，已經算是邁出很大的一步，中美雙方還是有意在這兩大核心利益之外的領域展開合作，此行興許也將帶來中美關係的變化。

注釋

- ¹ <https://udn.com/news/story/6813/7399163>
- ²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30828/gina-raimondo-china-agenda/zh-hant/>
- ³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30828/gina-raimondo-china-agenda/zh-hant/>

-
- ④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30828/gina-raimondo-china-agenda/zh-hant/>
- ⑤ 3月，中國當局拘留了美國諮詢公司美思明智集團在北京的五名中國籍員工；4月，當局對美國管理諮詢公司貝恩公司上海辦事處的員工進行問話；8月，中國政府以從事未經批准的統計工作為由，對美思明智處以1,068萬元。
- ⑥ <https://udn.com/news/story/6813/7399163>
- ⑦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30828/gina-raimondo-china-agenda/zh-hant/>
- ⑧ <https://udn.com/news/story/6813/7399163>
- ⑨ <https://udn.com/news/story/6813/7399163>
- ⑩ 例如李強、何立峰。
- ⑪ 例如何立峰，在北京市中心天安門廣場旁的人民大會堂前會見，還有總理李強。
- ⑫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30828/gina-raimondo-china-agenda/zh-hant/>
- ⑬ <https://udn.com/news/story/6813/7399163> 用詞
- ⑭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30828/gina-raimondo-china-agenda/zh-hant/> 用詞
- ⑮ <https://udn.com/news/story/6813/7399163>
- ⑯ <https://udn.com/news/story/6813/7399163>
- ⑰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30830/us-china-raimondo-decouple-he-lifeng/zh-hant/>
- ⑱ 指晶片、科技相關的法規。
- ⑲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30828/gina-raimondo-china-agenda/zh-hant/>
- ⑳ 或譯為「脫鉤」。
- ㉑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30830/us-china-raimondo-decouple-he-lifeng/zh-hant/dual/>
- ㉒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30830/us-china-raimondo-decouple-he-lifeng/zh-hant/dual/>
- ㉓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us-commerce-chief-leaves-china-on-upbeat-note-after-uninvestible-remark-20230830/7247311.html>
- ㉔ <https://udn.com/news/story/7331/7397785>
- ㉕ <https://www.rfi.fr/tw/專欄檢索/要聞解說/20230827-美商務部長雷蒙多訪華任務微妙-尋求一艱難的平衡>
- ㉖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3/0830/c64094-40066682.html>
- ㉗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30830/us-china-raimondo-decouple-he-lifeng/zh-hant/dual/>
- ㉘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中美深入交談近四個半小時-兩國商務部宣布成立工作小組-060005759.html>
- ㉙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30830/us-china-raimondo-decouple-he-lifeng/zh-hant/dual/>
- ㉚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us-commerce-chief-leaves-china-on-upbeat-note-after-uninvestible-remark-20230830/7247311.html>
- ㉛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308280030.aspx>
-

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 第 148 期

Mainland China Studies Newsletter No.148

<https://politics.ntu.edu.tw/?p=24994>

發行者：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贊助者：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

榮譽主編：石之瑜（臺大政治學系教授）

主編：黃旻華（臺大政治學系教授）

執行編輯：唐欣偉（臺大政治學系副教授）

編委會：石之瑜（臺大政治學系教授）

黃旻華（臺大政治學系教授）

徐斯勤（臺大政治學系教授）

張登及（臺大政治學系教授）

唐欣偉（臺大政治學系副教授）

蔡季廷（臺大政治學系副教授）

廖小娟（臺大政治學系副教授）

編輯助理：陳聿伶、趙婉婷

地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電話：886-2-3366-8450

傳真：886-2-2365-3433

印刷者：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電話：886-2-2382-1120